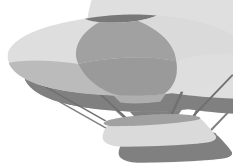


經濟弱勢家庭自我效能感對社會支持與受扶助年數中介效果之探討——以家扶基金會南投家扶中心單親受扶助家庭為例



林平烘 · 林淑玲

摘 要

貧窮的原因有多種可能，脫貧的方法卻不容易找到及時且立即有效的萬用仙丹。社會資源的投入以協助個人或家庭脫離貧窮已行之有年，然而社會資源的利用是否代表個人或家庭終將脫離貧窮？受扶助者在接受社會資源的協助後有辦法自行脫離被協助的狀態？學理顯示一個人要能夠擺脫困境，除了外在的協助之外，個人內在對於自我的評估，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擺脫困境的效能感是個重要的因素。

透過本研究，研究者想瞭解，提供社會支持或社會資源予受助家庭，是否有助於受助者脫貧？探討受助者接受的社會支持與受助年數之間，是否透過受助者之自我效能感而產生影響，以作為未來脫貧方案施行之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之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朋友及民間團體，來自配偶的支持最低；在獲得的社會支持類型方面，則以情感性支持程度最高，訊息性支持程度最低。在社會資源利用對社會支持及受扶助年數的中介效果部分，結果發現實質性支持及民間團體支持能透過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降低受助者之受扶助年數。

研究者建議未來政府或民間團體在規劃辦理各項脫貧方案時，應將「教育」的部份納入考慮，尤其是要求受扶助家庭參與教育課程，不只提供實質性的支持，更需要加強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強化其自我效能，才能有效達成脫貧方案的目標。

關鍵字：脫貧方案、社會支持、自我效能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of 40 Nantou TFCF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a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ases' social supports mainly come from friends and the NPO, and is lowest from spouse's support.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s informational supports to poverty durations will be mediated by cases' self-efficacy.

The authors will suggest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ases' self-efficacy by request participating educational curriculum.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壹、前言

受到全球化資本流動、科技流動、種族流動等因素的影響，現代社會中的家庭深受貧窮推擠和勞動力短缺的牽引。「貧窮」議題已日漸被人類服務工作者所關注；社會上出現的新貧階級，更是當今最值得關注的議題之一。新貧窮者是跨階層的（以前窮人爲失去工作能力者，如老、殘、弱者等之失能者；現在的窮人也可能是工作中的窮人 *working poor*），也可能在個人一生中多次面對此一困境。而貧窮者在欠缺自我效能之際，其下一代，落入貧窮的世代性即更爲可能。

人類生存的社會原本就是一個碩大的生態系統。生活其間的個人不時的受到小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及大系統的影響。而貧窮的意義，不管是從相對貧窮、絕對貧窮、或主觀貧窮的角度視之，貧窮的出現皆爲生存其中的某一個（或多個）系統之間出現了問題影響個人心態所致。

陷入貧窮的原因有多種可能，脫貧的

方法卻不容易找到及時且立即有效的萬用仙丹。社會資源的投入以協助個人或家庭脫離貧窮，已有不少政府及社會福利機構提供並行之有年，然而社會資源的利用是否代表個人或家庭終將脫離貧窮？相關研究是否支持受扶助者在接受社會資源的協助後有辦法自行脫離被協助的狀態？還是形成一種長期的福利依賴？一個人要能夠擺脫困境，除了外在的協助力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有沒有意願或者是否有動機要擺脫困境。換句話說，一個人內在對於自己的評估，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擺脫困境的效能感是個重要的因素。

家扶基金會南投家庭扶助中心（以下簡稱南投家扶），創立的重要目的之一爲協助有幼童的單親家庭渡過經濟困境。在現有的 1633 戶扶助家庭中有八成以上的家戶爲單親家庭（其餘部份的家戶爲父、母一方無工作能力，或爲失蹤、離家出走等之家庭缺席者）。受助的家庭，從最新開案救助到扶助十年左右皆有。在長期救助的工作中，除了對受助家庭提供定期的生活

補助外，最近四年亦連續每年進行脫貧方案的實施，期望透過暫時的救助而達到受助家庭自立、脫貧的目標。然而，從實務工作經驗及理論檢視，研究者更想瞭解，提供社會支持或社會資源予受助家庭，是否有助於受助者脫貧？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根據貧窮動態的理論，探討受助者接受的社會支持與受助年數之間，是否透過受助者之自我效能感而產生影響，以作為未來各地區家扶中心脫貧方案之施行方向之參考。

貳、貧窮動態與自我效能

經濟弱勢家庭一般指的為社會救助法中所指的低收入戶或遭遇急難或災害者的家庭。這個名詞意味著家庭的收入明顯的不足以應付家庭一般支出之所需，尤其在正常的情形下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者(breadwinner)已竭盡所能，收入仍明顯不足，而成為社會救助對象的主要對象(薛承泰，2008)。民國94年修正通過的社會救助法，明訂針對救助對象提供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第二條)。可看出社會救助法的目標在讓需要者渡過當前的難關，然而這些社會救助對於處於困境的單親家庭而言，也只能幫助他們勉強渡過“當前的難關”，如果沒有其他的介入方式，這些弱勢家庭可能就需要安於貧窮不得翻身，最後真的只能等待子女長大或自然老死，才能脫離經濟弱勢(王德睦，2004)。

依據 Bauman (2003)的看法，經濟弱勢

的現象並不能夠單純的化約成物質匱乏與身體痛苦，經濟弱勢也包含個人的社會和心理狀態。個人的社會適應是否良好，其判定標準並不是由個人自行決定，乃是由社會中特定的一群人的生活標準來衡量，而這群人通常是代表社會主流價值的中上階層。Bauman 同時指出，經濟弱勢意味著「達不到標準」，這導致弱勢者自尊低落，覺得羞恥或是內疚。鄭麗珍(2004)也指出，經濟弱勢可以指射任何一件事，例如低收入戶、低消費能力、破舊住宅、擁擠的居住空間、無法參與健保、低教育程度及其他未滿足的基本需求。

這種經濟上的弱勢，使得家庭提供給年輕孩子的照顧不足，進而使其發展受阻、失去公平的發展機會(Root, 2004)。美國的研究，經濟弱勢家庭子弟的輟學率是富裕家庭子弟的二倍，經濟弱勢是家庭危機的主要因素，也是學習失敗和其他危機的重要因素(J. J. McWhirter, B. T. McWhirter, A. M. McWhirter, & E. H. McWhirter, 1998)。經濟弱勢也意味着得不到機會，在特定社會裏過所謂快樂生活，無法獲得生活所需的事物，這會導致怨恨和憤慨，以暴力或自我貶抑，或兩者兼有的形式宣洩出來。需求不滿足的主觀感受，以及伴隨這種感受的那一切污名與恥辱的痛苦，更因為生活水準降低和社會比較、社會剝奪漸增的雙重壓力而加劇。Hauser (1997)曾指出，家庭結構的形成方式和家庭的經濟社會資源會直接影響個人的幸福感，可見經濟弱勢家庭對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影響既大且深。

國內學者孫世雄和胡韶玲(2008)也指出，經濟弱勢單親家庭比一般家庭有更明顯的脆弱性，一旦落入貧窮，其他的生活問題也很容易緊隨而至。單親家庭在適應生活的歷程中常面臨多重的問題，尤其是低社經地位的單親母親，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更是缺乏，因而在脫貧的漫漫長路，單親家庭本身想擺脫貧窮的力量就更顯得重要。

所謂「貧窮」(Poverty)究竟該如何定義？「貧窮」是一種可以經由一個特定數字而明確界定的概念？還是一種心理狀態？人們「貧窮」是因為結構的因素惡性循環造成？還是因為「貧窮文化」代代相傳而來？不論是那一個時代的那一種論點，貧窮研究的最終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找到致貧的原因，以及脫貧的有效策略。經過社會學者長期的研究，今日有關貧窮現象的解釋，大多傾向於貧窮動態(Poverty Dynamics)的觀點。在 1990 年代以後有關貧窮動態的理論主要從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其中包括：(1)貧窮不只是一種狀態，而是有多種不同時間性型態，包括短期、中期、長期，貧窮是個人生命歷程中的一個（或某些個）階段；(2)貧窮不是特定階級所有，中間階級在某些生命歷程也可能落入貧窮；(3)貧窮者並不是無力回應外在環境影響的受害者，而是可藉由有目標的行動，培養窮人的自我效能來克服貧窮；(4)貧窮與個人發展歷程中的事件和轉折點有關，每個人所經驗的貧窮與因應可能都有所不同（呂朝賢，2007）。此一觀點認為個人貧窮地位是會流動的，而不是只受

到結構的影響；個人有能力選擇不同的生命軌道，建立自己向上流動的人生機會。換句話說，今日對於個人落入貧窮的原因，認為不只是結構的問題，還要視個人在生命歷程中經驗到的事件與其時間而定；更重要的是，個人是有能力掙脫前述的因素，改變自己貧窮的處境的。

貧窮及脫貧思維在英國 1997 年以後的勞工黨政策中展現，強調個人應為自己的未來處境負責。近幾年來國內公私部門致力於脫貧方案的實施也正方興未艾。以公部門而言，台北市政府於 2000 年針對經濟弱勢家庭辦理為期三年的“家庭發展帳戶專案”，主要是針對首度購屋、小本創業或要接受高等教育需求之家庭，提供每月 2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的相對配合款補助，並要求參與方案的家庭，三年內需接受 234 小時（78 學分）的教育課程，以及每年至少一次之個別諮商與輔導（鄭麗珍，2005）。2003 年台北市政府再度推出為期三年的“出人頭地發展帳戶專案”，主要方案對象為經濟弱勢之在學第二代（16 歲至 23 歲）之子女。教育課程、個別諮商與輔導之時數與家庭發展帳戶之要求一樣，只是課程內容不一樣，及參與方案之同學每年需提供 72 小時公共服務（王玉珊，2004）。

高雄市政府則於 2001 年推出“高雄市二代心希望工程”，企圖以積極的福利方案，協助經濟弱勢戶提早脫離貧窮，將社會救助政策由傳統的補救性思考帶向充權的觀點與做法，以教育、理財、參與、支持四大策略，期使參與方案的成員擁有

正確的人生態度，走入社會、參與社會強化其自尊心，以及早脫貧自立（宋雅琪、葉玉如，2005）。

非政府組織持續推動脫貧方案的例子，可以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為例說明之。家扶基金會為瞭解該基金會所扶助的經濟弱勢家庭之問題與需求，於2004年進行「扶助家庭及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在瞭解經濟弱勢家庭之生活樣貌之後，自2004年開始陸續於全國各地持續推動“家長發展帳戶、青年自立釣竿計劃、幼兒啟蒙方案”等三種不同類型的脫貧方案（周慧香，2005）。三種不同脫貧方案之實施，除了針對參與方案對象之不同，設計不同的教育訓練課程及不同的經費補助方式（例如家長發展帳戶及青年自立釣竿計劃採用每月1000元至4000元不等之相對配合款補助；幼兒啟蒙方案則對參與方案的家庭予以每童每月補助3000元幼兒園教育費用及每月2公斤奶粉補助），方案的內容大致與公部門施行內容相似：相對配合款補助、一定時數的相關教育課程，要求參與的家長及青年提供部份的公共服務時數。從上述有關國內脫貧方案的探討可以瞭解，大多數的脫貧方案皆重視對受助者為自己的處境負起責任的要求，不再單純的只提供各種社會資源。

但是，是否要求受助者負起責任，即可解決貧窮的問題呢？呂朝賢(2007)引用Fourage和Layte的研究資料指出，所有國家在貧窮救助的工作上，皆呈現「貧窮持續時間越長，越不易脫離貧窮」的現象。經濟弱勢本身既是原因，也是結果。

Kinney、Haapala和Booth(1991)認為，人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學習的，人們從混亂中、失敗中，即使他不是心甘情願，都可以透過學習來改變。Sachs(2007)也指出，脫離經濟弱勢往往需要外力協助，若無適時的提供教育與訓練，極容易形成經濟弱勢的惡性循環。

Bandura(1997)的自我效能理論認為，自我效能感在個人認知與行為之間扮演的是中介變項的角色。他認為低效能者會有堅持度較低、沮喪、自我譴責歸因及角色滿意較低等特質。反之高效能感者，認為自己透過學習可以增進個人的競爭力，也因此願意投注在教育、學習以增強個人克服挫折及面對挑戰的能力。

Bandura(1997)也具體指出個體增強自我效能感來自以下四個層面：一、過去的精熟經驗(mastery experiences)，成功的經驗能為個人建立健全的自我效能感，是個人成功最有力的證據，其會成為個人面對下一次挑戰的自我效能訊息來源，使個人更有信心且有效的解決問題。當成功經驗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個人會將失敗的經驗視為是對個人能力的磨練，使個人對於未來的任務能有更好的控制，進而反敗為勝。

二、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s)，個人藉由觀察楷模所得的替代經驗，也是自我效能感的來源之一。個體藉由觀察他人的表現可以判斷或衡量自身的能力，當特質與自己相似的楷模因努力而獲致成功時，個人的自我效能感將提高。

三、語言說服(verbal persuasion)語言說服乃是他人利用鼓舞性的談話或正向的

回饋來使個人相信其具有完成任務的能力，藉以增加自我效能感。語言說服除了傳達正向的回饋之外，亦具有人際支持的功能；當個人遭遇困難時，重要他人對個人能力的堅定信念，將增進個人的自我效能感。

四、生理與情緒狀態(physiological and emotional states)個人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時，自我效能感也隨之提高；當個人焦慮、沮喪時，自我效能感將隨之降低。相同的身心狀態，個人對身心狀態的不同解讀，將會影響其到自我效能感，要增進自我效

能必須強化個人的生理狀況，降低壓力及負面的情緒，並且導正個人對身心狀態的錯誤解讀。

綜上所述，自我效能感的建構是一種自我說服的複雜歷程，效能感一經建立將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個人的行為。自我效能感較高者，即使遭遇困難也會持續努力克服。因此增強個人的自我效能感，將可促進其行為的改變。應用 bandura 的立論在本研究中，自我效能為過去表現與策略分析、個人目標的中介變項，其間關係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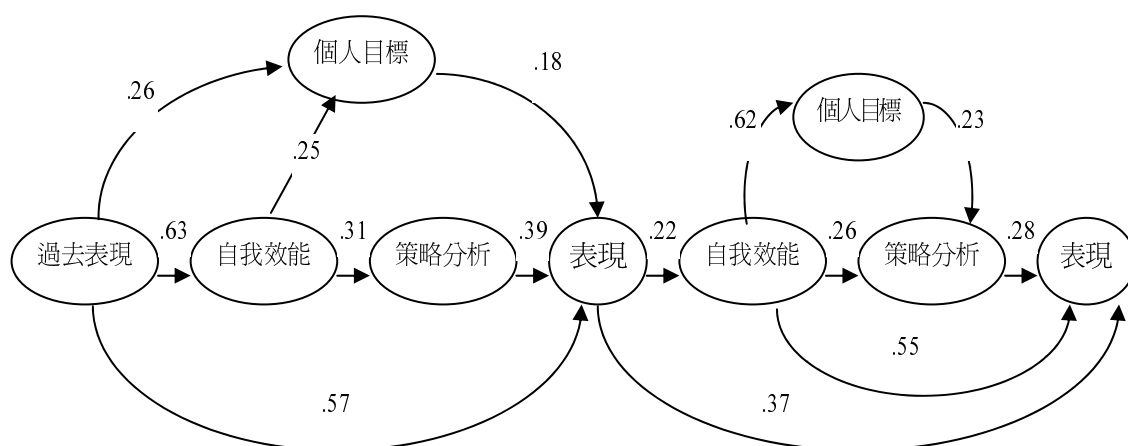


圖 1 個人表現的因果結構徑路分析(引自 A. Bandura, 1997, P. 122.)

Bandura 認為個人對於環境與事件的因應並非被動的，而是在個人、環境與行為表現三者之間取得平衡。因為個人具有(1)運用象徵性符號的能力，經由符號傳遞學習，並指引行動；(2)預期未來的能力，並引導未來的個人目標；(3)經由觀察他人

的行為及結果而學習的替代學習能力；(4)按照內在標準對自己的學習進行評估的自我管理能力；(5)自我反省的能力（王璦璇、王瑞霞、林秋菊，1998）。上述個人知覺的個人目標，與其結果預期、歸因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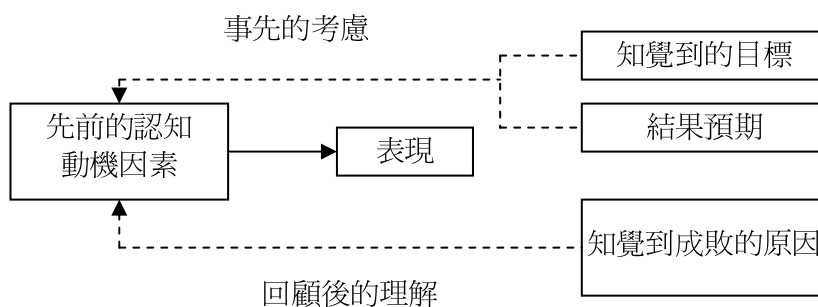


圖 2 基於個人知覺的個人目標，與其結果預期、歸因建構的認知動機概念架構
(引自 A. Bandura, 1997, P.123.)

根據 Bandura 的觀點，低效能者會有堅持度較低、沮喪、自我譴責歸因及角色滿意度較低的特質。而改變的歷程需要更多的支持：從知道到做到之間，有些人需要漫長的掙扎努力尋找一條對自己最有利的路，有的人可以很快的就表現出來、其間的差距主要來自：(1)衝擊有多大，換句話說個人改變的動機有多強烈；(2)個人尋求改變的歷程是否獲得支持與協助（林淑玲、林平烘、許靜芳，2005）。這些自我效能感改變的行為，正是與社會支持有着相輔相成的關係。

從圖 1 可以瞭解，自我效能是個人過去表現與未來表現之間的中介因素，而自我效能是否也是外來的社會支持與個人行為（採取某種行動）的中介因素呢？國內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社會支持與自我效能之間有正相關，但是社會支持並不能直接解釋個人的行為或行動。例如在張美雲、林宏熾(2007)探討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社會支持與賦權增能之相關的研究中，其研究中所稱的「賦權增能」包括(1)自我效能；(2)

自我決策；(3)影響力；(4)接觸資源；(5)賦予能力；(6)社區參與；及(7)自我擁護等七項。經典型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知覺的情緒支持、訊息支持增加，其賦權增能的七種能力也提升；而從社會支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分類來看，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增加，其賦權增能的七種能力也會提升。黃淑貞(1997)以台灣師範大學的 600 名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不吸菸的自我效能是區別學生吸菸與否的重要因素，而社會支持和吸菸與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在陳滋次、張媚、林豔君(1998)以糖尿病患為對象的研究中，社會支持與其自我照顧行為沒有相關，但是透過迴歸分析瞭解，自我效能對自我照顧行為的解釋量高達 76.3%。

在大陸的相關研究則證實自我效能是社會支持與個人行為、行動的中介變項。例如許有雲、趙必華(2008)的研究中證實自我效能感能部分中介安徽省 405 名中小學教師主觀社會支持與其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魏曙光、張月娟、席明靜、

張春湘、張娣(2006)的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可以調節大學生面對壓力事件時的抑鬱情緒反應；而自我效能感則是部分中介大學生面對壓力事件時的抑鬱情緒反應。

上述有關自我效能是社會支持與個人行為、行動的中介因素的研究，其研究對象大多並非社會資源利用的弱勢者，其研究結果是否得以推論至家扶中心扶助的經濟弱勢家庭呢？鄭麗珍(2005)在其探討台北市「家庭發展帳戶專案」的研究中提到，受助家庭不只是累積了金錢而已，更重要的是透過受助的過程，與其他參與人發展支持性的社會網絡，建立信任的朋友關係，並相互勉勵，感受到被增權的經驗，提升了個人的心理能力。從這個研究結果，或許值得進一步探討自我效能感在社會支持與脫離貧窮之間的角色。

尤其是今日台灣地區受到全球經濟緊縮的衝擊，各界捐款逐年降低(自由時報，2008；林建成，2001)。如何有效率的運用各界的捐款，並降低受扶助家庭對於社會資源的依賴，有待從事人類服務的教育工

作者、社會工作者，關注如何在社會支持、社會資源挹注之際，從教育的角度，增進受助者的自我效能，以探究脫貧方案的有效施行，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根據前述 Bandura 自我效能的觀點，研究者以自我效能中介變項，應用其影響轉換，支持受試者在接受社會支持、社會資源能同時培養受試者的自我效能以增進，乃為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議題。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問題有二：

1.受扶助者知覺之社會支持程度如何？其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如何？

2.受扶助者知覺之社會支持是否會透過其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而影響其受扶助年數？

茲根據研究問題繪製研究架構如圖3，並分別說明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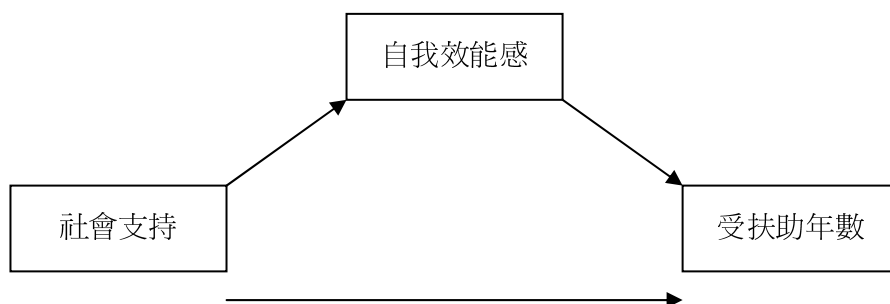


圖3 本研究架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南投分事務所，目前仍在關心幫助之，散居在全縣 13 鄉鎮內的受扶助單親家庭 40 戶。截至 97 年 7 月底止，南投分事務所之扶助家庭共 1,633 戶，取樣比率約為 2.4%。受試之選取係依據其扶助年數的長短，區分為受扶助 10 年以上，10 年至 5 年之內，5 年以下三類。以研究期間與主責社工員有接觸的家庭在各鄉鎮隨機取樣，不同扶助年數級距的家庭分別各取 12 戶、12 戶，及 16 戶。受試中 39 位為女性戶長，1 戶為男性戶長。所有受試之受扶助年數，最少為 3 個月，最長為 194 個月（16 年 2 個月），平均 74 個月（6 年 2 個月）。

整個探討研究針對南投家扶受助家庭依據扶助年數的長短進行立意取樣，選取現有受助家庭中，扶助未滿五年的家庭十六戶、扶助五到十年十二戶，及扶助十年以上家庭十二戶的三個群主共 40 戶為樣本，進行社會支持網絡調查，探討個人社會支持網絡的密度、網絡的大小、及網絡與自我效能的關係？嘗試瞭解其間是否存在：有較強的社會支持網絡者，相對的會有較強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較強的人是否較容易建立個人支持網絡，進而有較大的機會脫貧。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工具包括謝雪娟修訂之「社會支持網絡量表」及研究者自編之「社

會資源利用效能感量表」二種。

「社會支持網絡量表」為謝雪娟(2008)所修訂，目的在於測量受試所知覺到來自不同對象所提供之社會支持，全量表共 10 題，歸納為實質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及訊息性支持三類；每題再就其支持來源分為配偶、親戚、朋友、學校、政府，及民間團體六種。全量表內部一致性為.927；因素分析萃取六個因素，解釋量為 62.374%，各因素之因素負荷由.410 至.950。本量表為 Likert 5 點自陳量表，從從來沒有到總是，分別計 1 至 5 分，由受訪者自行填寫，部分受訪者由於教育程度因素，由訪員作簡要說明。

「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量表」由研究者根據 Bandura (1997)之自我效能感理論編製，目的在測量受試之社會資源利用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表示受試對於自行尋找及利用社會資源的信心越高，越不需要被動依賴他人的救助。預試量表編擬 17 題，以一般成人 51 人為預試對象。預試問卷經信度分析及因素分析（摘要如附表 1），得到二個因素，全量表內部一致性為.9071，因素分析可解釋量為 66.656%，各因素負荷介於.577 至.854 之間。本量表亦為 Likert 5 點自陳量表，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計 1 至 5 分，由受訪者自行填寫，部分受訪者由於教育程度因素，由訪員作簡要說明。

三、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由第一作者所屬之分事務所 7 名社工員直接交由選取之受扶助家

庭戶長填寫。調查訪問前，第一研究者並向所有參與之社工員說明本研究之意義，及進行調查訪問應注意事項，以藉由較一致性的調查訪問程序，避免訪問過程所造成的偏誤。研究資料回收後，進行資料編碼與鍵入。由於是社工員直接送到家請受扶助戶長填寫，如有不瞭解之處即時回答並處理，因此並無漏答或廢卷。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研究問題一方面，受試知覺之社會支持程度、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的狀況，經以描述性統計分析資料，其各向度之平均數及標準差如下表 1。在受試之效能感

部分，全量表共 10 題，題平均數為 3.356，略高於五點量表之中間分數 3 分，表示受試之自我效能感尚可。在社會支持程度部分，社會支持總分之題平均數為 1.906。為比較不同來源及不同類型社會支持之得分高低，以成對樣本 *t* 檢定考驗受試者所獲得之不同來源及不同類型社會支持程度高低。結果發現其所獲得之社會支持程度最高者為民間團體情感支持及朋友情感支持，其次為政府實質支持、民間團體實質支持，及民間團體資訊支持，最低者為配偶資訊支持及配偶實質支持。其檢定結果摘要如下表。

表 1 受試者社會支持、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題個數、平均數及題標準差及排序摘要

N=40			
項目	題平均數	題標準差	排序
社會支持總分	1.906	.451	
民間團體情感支持	3.163	1.158	1
朋友情感支持	3.019	1.084	1
政府實質支持	2.550	.973	3
民間團體實質支持	2.475	1.019	3
民間團體資訊支持	2.250	.840	3
朋友實質支持	2.088	.784	6
朋友資訊支持	2.013	.640	6
學校情感支持	1.919	.922	6
政府情感支持	1.906	1.096	6
親友實質支持	1.900	.652	6
學校實質支持	1.713	.831	6

項目	題平均數	題標準差	排序
政府資訊支持	1.638	.630	12
親友情感支持	1.513	.762	12
親友資訊支持	1.488	.700	12
學校資訊支持	1.363	.549	15
配偶情感支持	1.281	.696	15
配偶資訊支持	1.131	.375	17
配偶實質支持	1.100	.362	17
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總分	3.356	.709	
因素一： 與外界溝通互動效能感	3.365	.737	1
因素二： 尋求資源效能感	3.350	.748	1

在支持來源部分，可以看到民間團體支持及朋友支持程度最高。由於本研究受試為來自南投家扶的扶助個案，且由社工員直接送達家裡填寫量表，因此無法排除受試在填答時直接感受來自社工員的支持或人情壓力進而影響填答的結果，未來的研究或許可以考慮排除此一因素的影響力。此外，由於參與研究之 40 名受試者皆為單親家長，其配偶支持得分最低，單題平均數為 1.185 分；在社會支持量表的計分部分，以五等量表之 1 分代表從來沒有獲得支持而言，受試者表達之得分反應其實際生活經驗，顯示填答者並未亂答。

為探討研究問題二：受試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是否會透過其個人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影響其受扶助年數長短，本研究採用 causal steps 的方式考驗中介變項（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對社會支持及受扶助年

數的影響，以考驗研究問題二。根據 Karl(2003)對中介變項考驗的觀點，採用 causal steps 為考驗中介變項的統計方法需符合下列準則：(1)自變項必須與依變項相關，(2)自變項必須與中介變項相關，(3)控制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中介變項必須與依變項相關，(4)當排除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若自變項與依變項不存在相關，則為完全中介(complete mediation)；當排除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若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降低則為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on)。

首先計算自變項、中介變項及依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結果發現所有的自變項中只有「政府資訊支持」與中介變項之「尋求資源效能感」，及依變項「受扶年數」有顯著相關（如下表 2）；接著以逐步迴歸的方法，先進行「政府資訊支持」對及依變

項「受扶年數」的預測，再進行「政府資訊支持」及「尋求資源效能感」對依變項「受扶年數」的預測，比較兩組標準化迴歸方程式中，自變項對依變項的 β 絕對值是否顯著減少，如減少則表示中介變項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根據表 3 資料可知，自變項「政府資

訊支持」在中介變項「尋求資源效能感」加入後之 β 絕對值顯著減少，顯示「政府資訊支持」會部分透過受試者之「尋求資源效能感」而影響其「受扶年數」。如進一步就其相關係數來看，提供受試者政府資訊性支持，可以提高其尋求資源效能感，再進而降低其受扶助年數。

表 2 尋求資源效能感、社會支持及受扶助年數之相關

	受扶年數	尋求資源效能感
受扶年數		
尋求資源效能感	-.395*	
政府資訊支持	-.374*	.370*

* $P < .05$

表 3 尋求資源效能感對社會支持及受扶助年數之中介效果摘要

模式	依變項	投入變項	R	R ²	R ² 改變量	β	F
1	受扶助年數	政府資訊支持	.374	.140	.140	-.374	6.173*
2	受扶助年數	尋求資源效能感	.465	.216	.056	-.298	5.106*
		政府資訊支持				-.264	

上述研究結果發現，政府資訊支持提供可以降低受助者之受扶助年數，但如果能增進受扶助者之尋求資源效能感的話，將可以再降低其受扶助年數，這可能是未來政府及民間團體致力脫貧方案時可著力之處。

伍、結論與建議

由於社會資源緊縮，民間團體募款額度逐年降低，如何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在

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各項救助方案時需要考慮的重要議題。本研究目的在跟據生命歷程貧窮動態的觀點，瞭解南投家扶中心受扶助家庭知覺到之社會支持程度如何，其社會資源利用之效能感如何，並進一步探討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對社會支持及受扶助年數有中介之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之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民間團體及朋友，來自配偶的支持最低；而其知覺到的社會支持程度約為「偶爾」。

在社會資源利用對社會支持及受扶助年數的中介效果部分，結果發現政府資訊性支持能透過尋求資源效能感，降低受助者之受扶助年數。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研究者建議未來政府或民間團體在規劃辦理各項脫貧方案時，應從「教育」的角度考慮納入提供提升受助者尋求資源效能感之課程，強化其自我效能，或可提升脫貧方案的效能。此外，未來的研究可針對不同受助單位扶助

的家庭間的比較，以及透過探討社會支持、自我效能感、受扶助年數之間的動態關係，尋找扶助年數的臨界點，以有效運用社會資源，也免於長期扶助反而造成受扶助家庭福利依賴的現象。

（本文作者：林平烘現為南投家庭扶助中心主任、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家庭教育組博士生；林淑玲現為嘉義大學家庭教育暨諮商研究所教授）

參考文獻

- 王玉珊(2004)。台北市貧窮政策與方案，收錄於「*貧困家庭自立脫貧方案與實務研討會彙編*」，頁 92-98。台中：家扶基金會。
- 王德睦(2004)，貧窮的動態分析。收錄於「*貧困家庭自立脫貧方案與實務研討會彙編*」，頁 4-12。台中：家扶基金會。
- 王環璇、王瑞霞、林秋菊(1998)。自我照顧行為、自我效能和社會支持對初期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之影響。*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14, 807-815。
- 自由時報(2008-05-20)。社福團體 募款寒冬。2008 年 9 月 10 日取自網址：
<http://news.yam.com/tlt/life/200805/20080520472617.html>。
- 呂朝賢(2007)。貧窮動態及其成因—從生命週期到生命歷程。*臺大社工學刊*, 14, 167-210。
- 宋雅琪、葉玉如(2005)。心希望—新的希望~高雄市第二代心希望工程實務經驗分享，收錄於「*別讓貧窮拖垮他—兒童貧窮與脫貧方案國際交流研討會成果彙編*」，頁 306-320。台中：家扶基金會。
- 周慧香(2005)。家扶基金會「扶助家庭及兒童生活狀況調查」暨「脫貧服務方案實施概況」，收錄於「*支點雙贏—大專青年自立脫貧研習會手冊*」，頁 2-19。南投縣政府未出版。
- 周麗端(2005)。工作與家庭，收錄於「*家庭資源與管理*」，頁 144-184。台北：國立空大。
- 林建成(2001)。加入 WTO 對我國社會福利發展之影響。*國政評論*，社會（評）090-183 號，2008 年 9 月 10 日取自網址：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0/SS-C-090-183.htm>。
- 林淑玲、林平烘、許靜芳(2005)。母職增能 親子加分，*北縣成教*94(6)。北縣：台北縣政

府教育局。

胡韶玲、孫世雄(2008)。低收入戶單親母親的復原歷程：論親子力量的影響，收錄於「家庭壓力與韌性」，頁 61-105。台北：五南出版社。

馬偉娜、林飛(2006)。大學生社會支持、自我效能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4(6)，641-643。

張美雲、林宏熾(2007)。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社會支持與賦權增能之相關研究。《特殊教育學報》，26，55-84。

許有雲、趙必華(2008)。中小學教師自我效能感對社會支持和生存質量的中介作用評介。《中國學校衛生》，29(6)，541-534。

陳滋次、張媚、林豔君(1998)。自我效能、社會支持與糖尿病病人居家自我照顧行為相關之探討。《護理研究》，6(1)，31-43。

黃淑貞(1997)。大學生健康信念、自我效能、社會支持與吸菸行為研究。《學校衛生》，31，30-44。

潘淑滿(2000)。《社會個案工作》。台北：心理出版社。

鄭麗珍(2004)。兒童及家庭貧窮問題與需求探討，收錄於「貧困家庭自立脫貧方案與實務研討會彙編」，頁 24-42。台中：家扶基金會。

鄭麗珍(2005)。“台北市家庭發展帳戶”方案的發展與儲蓄成效。《江蘇社會科學》，2，212-216。

薛承泰(2008)。近貧人口短期脫困計劃—工作家庭所得保障方案評估，《國政研究報告》。台北：台灣經濟研究院。

謝雪娟(2008)。社會支持網絡量表。未出版手稿。

魏曙光、張月娟、席明靜、張春湘、張娣(2006)。大學生群體中社會支持、自我效能感在應激與抑鬱間的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4(3)，300-302。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Y: W. H. Freeman & Company.

Bauman, Z. (2003)。《工作、消費與新貧》(王志弘譯)。台北：巨流出版社。

Garbarino, J. & Long, F. N. (1992).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the human service. In J. Garbarino ed.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nd ed. N.Y.: Aldine de Gruyter.

Hauser, R. M. (1997). *Indicators of children's well-being*. N.Y.: Russell Sage。

J. J. McWhirter, B. T. McWhirter, A. M. McWhirter, & E.H. McWhirter, (1998)。《新新人類五大危機：綜合輔導策略》。(王寶墉譯)。台北：心理出版社。

Karl, L. W. (2003). Statistical tests of models that include mediating variables. Retrieved May, 13, 2005, from <http://core.ecu.edu/psyc/wuenschk/MV/multReg/MediationModels.doc>

Kinney, J., Haapala, D. & Booth, C. (1991), *Keeping families together: The homebuilders model*.

N.Y.: Aldine de Gruyter.

Root, M. (2004). The Developing child in changing environment, on the Book of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110-126. Ca : Jossey.

Sachs, J. D.(2007)。終結貧窮（鐵人雍譯）。台北：臉譜出版社。

附表 1 社會資源利用效能感量表信度與效度摘要

因素	題目		解釋量	α 值
因素一	1.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去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外界資源	.846	34.920%	.9015
	2.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想辦法尋找自己所需要的外界資源	.801		
	3.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靈活運用不同的方法，去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外界資源	.772		
	4.我在尋求協助時，自信有足夠的能力和協助我的人互動良好	.771		
	5.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有效的對協助我的人說明自己的需要	.663		
因素二	6.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調整自己和他人互動的方式，來讓協助我的人瞭解我的需要	.854	31.736%	.8347
	7.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從不同的管道，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外界資源	.782		
	8.即使別人不看好，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找到自己需要的外界資源	.740		
	9.當我需要外界支持協助時，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找到可以求助的管道	.629		
	10.我自信有足夠的能力從求助的外界資源，補足自己的不足或需要	.577		
	合計 10 題		66.656%	.9071